



佰“满洲国”始末

历史知识丛书

江西人民出版社

历史知识丛书

伪满洲国始末

张田实 改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南昌

1029323

本书根据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版由姜念东、伊文成、解学思、吕元明、张辅麟所著《伪“满洲国”史》改编。

伪“满洲国”始末

张田实 改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75 字数8万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册

统一书号：11110·24 定价：0.60元

目 录

- 1 • “九·一八”事变前后
- 22 • 伪“满洲国”的建立
- 45 • 军事镇压及统治
- 57 • 经济搜刮与奴役劳动
- 87 • 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 106 •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与伪“满洲国”的覆灭

“九·一八”事变前后

(一)

一八六八年，封建的、闭关自守的日本，在激烈的阶级、民族矛盾推动下，实行革命和改革，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建立起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明治天皇政府。这在日本历史上称之为“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资本主义有了显著发展。但是，由于明治维新没有彻底消灭封建势力，所以日本农民不仅在政治上继续遭受地主阶级的残暴压迫，而且在经济上仍然处于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之下，要以收成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交纳地租，生活十分贫困，购买力极低。日本的农业人口在国民总人数中占绝大多数。他们的购买力低下，日本的国内市场就不能不十分狭小，加之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经济基础相当薄弱，资本原始积累很不充足。因此，日本的军阀官僚统治集团从一开始就把扩充军备和对外进行侵略当作国家的最高目的，制订了以“强兵为富国之本”的基本国策，主张抢在沙皇俄国和欧洲列强之前占领朝鲜，用以充当侵略中国

东北进而征服全中国的跳板。于是，便仿效西欧资本主义列强的做法，建立起一支近代化的常备军，走上对外进行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在一八七四年侵犯中国的台湾省；第二年，又派兵侵略朝鲜的军事重镇江华岛，强迫朝鲜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一八九四年一月，朝鲜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朝鲜统治阶级无力镇压，要求清朝政府出兵帮助。日本军阀便一面劝诱清政府出兵干涉，一面准备以此为借口，发动侵华战争。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看不透日本侵略者的险恶用心，派兵至朝鲜，帮助朝鲜统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日本军阀见清政府果然上当，便立即派兵侵入朝鲜，占领王宫、拘禁朝鲜国王，并发动大规模侵华的中日甲午战争，把战火很快就烧到鸭绿江边。之后，即分兵两路，一路渡过鸭绿江攻打中国东北的九连城和安东（今丹东）；一路在东北辽东花园口登陆，包抄大连和旅顺。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境内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横行无忌。仅在旅顺一地，就野蛮地屠杀了中国人一万八千有余。

然而，推行卖国投降政策的慈禧太后竟然示意李鸿章于一八九五年四月在日本马关（下关）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军国主义便以这个条约为依据，不仅强占了中国的台湾省和澎湖列岛；而且从中国清政府勒索到赔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同时，也把朝鲜强占为半殖民地。

根据“马关条约”，日本军国主义还强迫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作为它侵略中国的“重要战略基地”。沙皇俄国见日本要插足中国东北，使它的利益受到损害，便纠集德、法两国，逼迫日本放弃辽东半岛。在俄、德、法三国干涉下，日本

在强迫清政府答应付给三千万两偿金后，被迫放弃辽东半岛。于是，沙皇俄国乘机以“租借地”名义，霸占了辽东半岛，并逐步向中国东北进行侵略扩张。从此，日、俄两国争夺中国东北殖民霸权的矛盾日趋尖锐，终至于在一九〇四年爆发了争夺中国东北领土的日俄战争。

这次战争以沙皇俄国的失败而告终。日、俄双方于一九〇五年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根据这个“和约”的规定，日本从沙皇俄国手里夺去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以及由长春至大连的南满铁路；同时，还攫取了对朝鲜的直接统治权。

一九〇五年底，日本政府派小村寿太郎为代表，到北京和清政府进行谈判，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东三省事宜正约》及其“附约”，迫使清政府承认沙皇俄国所谓把辽东半岛“租借权”和南满铁路“让与”日本的事实；威迫清政府开放东北凤凰城、辽阳、铁岭、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满洲里等十六个城市，作为日本殖民主义者通商和居住的地方；日本还攫取了安奉铁路（丹东至沈阳）的直接经营权，以及鸭绿江右岸的木材采伐权，等等。从这以后，日本侵入中国东北的南部，沙皇俄国的势力退到中国东北北部。

于是，日本侵略者把中国的辽东半岛改称为“关东州”，设立殖民统治机构“关东都督府”，作为它侵吞东北并进而灭亡全中国的据点。一九〇六年末，日本以经营被它侵占的南满铁路为名，在大连设立“南满洲铁道股份公司”（简称“满铁”）。它对中国东北的掠夺达到惊人的地步。如果“满铁”一九〇七年的收支及纯益为基数一百，到一九二八年其纯收益增长率即为百分之二千一百一十，收入增加十九倍。

“满铁”从开业到一九三一年日本强占东三省为止，二十四年间，共付给日本政府红利一亿四千五百余万日元、付给股东红利二亿日元、付给英国及日本的公司债利息三亿余日元，另有公积金一亿八千八百余万日元。四项合计共八亿三千多万日元），并以“保护”南满铁路和日本侨民为借口，派两个师团常驻中国东北。一九一九年，这支部队被正式命名为“关东军”。

“满铁”和关东军这一文一武便相互勾结，豢养清室余孽恭亲王善耆和蒙古反动贵族巴布扎布，于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六年间，在中国东北策划“满蒙独立”，妄图把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使之成为日本直接控制的殖民地（此即日本制造伪“满洲国”的原始方案）。

日本侵略者策划“满蒙独立”的运动虽然没有得逞，但却以此而达到了对张作霖进行牵制和恫吓的目的。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也看出张作霖既拥有武装实力，又坚决反对革命，是可以利用的工具，便一方面与张作霖进行政治交易，暂时让他充当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代理人，另一方面又妄图通过卖国的袁世凯政府实现其鲸吞中国东北、灭亡整个中国的野心，于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以武力为后盾，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五月七日提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复。

“二十一条”全文共分五号。第一号是日本侵占山东的条款。根据这一条款，日本不仅继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帝国主义在山东的全部权益，而且还增加了修筑铁路、开放商埠等新的权利；第二号是日本长期占领中国东北南部、东部和内蒙的条款。根据这个条款，日本把旅顺、大连和南满、安奉两条铁路的“租借期”延长为九十九年，并强迫中国

承认日本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的土地“租借权”、“所有权”，以及居住权、工商经营权、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独占权等；第三号是关于日本垄断汉冶萍公司所属各矿的开采权和其它一切权利的条文；第四号是日本要求中国不得将沿海岛屿割让给第三国的条文；第五号是日本攫取中国政治、经济、警察、军事大权的条文。此外，日本还要求夺取中国湖北、江西、广东之间的主要铁路建筑权，以及在福建筹办铁路、矿山和整顿海口等的权利。很明显，日本军国主义妄图把中国的所有的一切都掌握到它的手中，使中国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独家殖民地。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帝国主义对他复辟帝制的支持，竟然除要求“容日后协商”“二十一条”中的第五号外，对其余的都予以承认。这就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以反对“二十一条”为主旨的爱国反日运动。这个运动终于迫使袁世凯宣布撤消帝制，袁世凯亦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唾骂声中死去；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阴谋也宣告失败。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并不甘心失败。它一面扶植张作霖军阀势力，企图通过他控制中国东北，一面在中国政府中寻找新的代理人。一九一七年六月十八日，日本寺内首相以“日华经济合作”为名，派他的亲信西原龟三为特使，用一亿四千多万日元资助北洋军阀段祺瑞^①；又以各种名目借款给段祺瑞政府五亿日元，以此在经济上控制了中国的金融财政、在政治上控制了段祺瑞政府，使其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

中国人民当即在全国各地掀起反对段祺瑞卖国政府的爱国运动。一九二〇年七月，段祺瑞政府被直系、奉系、西南

^①当时已当北京政府总理。

军阀的联合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便又支持东北军阀张作霖大打内战，既把张作霖当成为侵略中国东北的主要帮凶，又让他充当日本与其它列强争夺在中国霸权的工具。

由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不断高涨，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加之，日本企图独霸中国的野心引起其它帝国主义各国的忌恨，群起而攻之，使日本在国际列强中陷于孤立；而日本国内爆发的经济危机又使其陷于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之中等原因，日本政府于一九二七年六月至八月，先后召开多次“东方会议”，研究其对华政策，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日本政府在此“纲领”中，公然将中国领土区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宣称“关于满蒙尤其是东三省”，对于日本军阀和资本家来说，是一个“在国防上及国民生存上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特殊地区。他不能不对这个地区持有“特殊的考虑”的“责任”；在“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时，“都必须抱定决心，不失时机地”采取所谓“坚决自卫的措施”，维护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权益。

所谓“维护”日本在中国东北、蒙古的“特殊权益”，用具体策划这次会议的日本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格的话说，就是“使满蒙脱离中国本土，置于日本势力之下，由日本来参与该地的主权，并由日本担当该地的治安工作。如果这样露骨地说，可能招致麻烦，所以给它包上了一层‘东方会议’的糖衣”。

同年八月，日本政府还召开“大连会议”，进一步商议所谓“满洲问题”，研究具体贯彻“东方会议”的方针，策划扩大“满铁”权限、“修建铁路”、“经济开发”和“治安协定等”问题。

不论是“东方会议”还是“大连会议”，都研究了加强控制张作霖的问题。

张作霖出身于绿林。辛亥革命时，他率兵镇压了奉天（今辽宁省）的革命运动，当上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掌握了奉天省的主要兵权，引起日本军阀对他的注意。后来，他又乘袁世凯的统治濒于土崩瓦解之际，把奉天省的军政大权夺到手。并凭借日本的支持，向吉林、黑龙江省扩展地盘。至一九一九年，终于实现他“统一东北”的计划，掌握了东北三省的军政大权。一九二〇年七月，他带兵入关，与亲英的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联合掌握了北京政权。张作霖在关内大打内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因此，在一九二五年，中国各地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运动高涨起来。张作霖的部下郭松龄便乘势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取得联系，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倒戈，通电反对张作霖。日本关东军为支持张作霖，竟宣布郭松龄部队不得接近南满铁路线二十里之内。

日本之所以援助张作霖，是想借机诱迫张作霖割让海城以南各县、承认“二十一条”、出让在鸭绿江和浑江的航行权、承认东三省的铁路矿山均为中日合办和日本人在东三省有自由居住权、土地所有权，等等。

张作霖于一九二五年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打败郭松龄后，又率兵入关，重新控制北京政权，组成有三十五万人的“安国军”，并在北京成立起“安国军政府”，自称大元帅。时至一九二七年初，北伐军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节节胜利，在击溃吴佩孚、孙传芳部队后，进抵长江中、下游各省。此时，日本田中组阁，决定乘中国政局混乱之际，置张作霖于中国东北，使其完全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便训令日本

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向张作霖“施加压力”，着手解决所谓铁路问题；同时，任命日本“政友会”头子、财阀代表山本条太郎为“满铁”社长，让他向张作霖攫取铁路权益，解决“满蒙悬案”等，妄图把中国东北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但是，面对中国人民反日运动渐趋高涨的形势，张作霖有些踌躇，不敢公开出卖中国东北的主权，只答应用“密约”形式满足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筑铁路的某些要求。日本帝国主义态度强硬，毫不让步，甚至指使驻华公使芳泽“面劝张作霖下野”。张作霖自恃兵力雄厚，又妄想能依靠英、美势力钳制日本，迫其降低要求，因而拒绝下野，采取拖延态度。

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指使他的军队继续“北伐”，迫近了北京。日本帝国主义为保住东北这一势力范围，于五月二十八日发表“维持满洲治安宣言”，声称当“战乱一旦波及满洲时，帝国政府将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准备借机派兵到锦州、山海关，随即不断向沈阳增兵，企图混水摸鱼，实现占领整个东北的野心。田中首相亦命令驻在北京的芳泽公使劝告张作霖收兵回东北；如果不听劝告，因失败而退回东北时，日军将在山海关对其进行拦截。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凌晨，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乘专车从北京出发返回东北。日本政府便派人在南满、京奉铁路的交叉点——皇姑屯埋置二百枚方炸药，于六月四日清晨五时半，将张作霖乘坐的贵宾车等三节车厢炸翻。张作霖身负重伤，四个小时以后死去。这就是关东军一手制造的“皇姑屯事件”。

张学良继其父统领东北以后，在中国人民反日斗争的推动下，民族觉悟有所提高。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他就任东

北三省保安司令，与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妥协，悬挂“青天白日旗”，并着手修建与“满铁”平行的铁路，开工修建葫芦岛港。“满铁”因此而感到自己的垄断地位受到威胁。加之，虽然中国东北丰富的资源宝藏早已成为日本垄断资本家掠夺的对象（鞍山的铁、抚顺的煤、吉林和黑龙江省大森林的木材等。日本每年从中国东北、内蒙取得三亿日元资源；日本又大肆向中国东北投资，占有中国东北外国资本的七成以上。到一九三一年末，日本向中国东北投资总额达十七亿五千万日元，使中国东北变为日本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重要场所），但当时中国东北的经济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就连素负盛名的大豆等农产品的出口额也显著减少（一九二九年大豆出口额为三百万吨，到一九三〇年则激减至二百二十三万吨；大豆及其它农产品的价格也大为降低），中国东北居民的购买力因而大幅度降低。这就使日本和中国东北的贸易大大缩减，使“满铁”的收入激减，甚至在“满铁”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赤字（一九二七年“满铁”的收入为一亿二千二百一十万人民币，一九三一年则下降到八千五百四十七万人民币）。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政治和经济危机，寻找出路，便悍然走上向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道路。

（二）

从一九二九年七月开始，关东军参谋以板垣征四郎^①、

^①板垣征四郎，一九二九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

石原莞尔^①等为中心，到长春、哈尔滨等地进行了第一次“参谋旅行”，对怎样“攻击哈尔滨防御和海拉尔”、“关于占领地区怎样统治”等一系列问题，都进行了策划和研究。

不久，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又到辽西等地进行第二次“参谋旅行”，研究锦州等地的地形和攻打锦州等地的“现地战术”，并制订了“夜袭弓长岭”、“攻打奉天城要领”等方案。他们认为“奉天”城墙坚固，用炮轰和炸药炸都有困难，因而命令佐久间大尉专门研究选取易攻部位作为突破口这个问题。一九三〇年五月，日本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长畑俊六少将^②到东北，率领关东军参谋进行了第三次“参谋旅行”，策划侵占中国东北的罪恶勾当。关东军共先后组织过四次这种所谓的“参谋旅行”，秘密到中国东北的长春、哈尔滨、海拉尔、洮南、山海关、锦州等地侦察情况，秘密制订侵占中国东北的作战方案。据他们估计：当时，整个东北约有二十五万中国军队，其中沈阳附近约有两万精锐部队，并拥有飞机、战车、兵工厂、迫击炮厂等；而关东军只有一万零几百人。因此，石原莞尔密订“以寡制众”的方案。此外，自一九三一年初起，每逢星期六，关东军参谋都要参加策划和研究侵占中国东北的问题。“满铁”调查课、东亚经济调查局的有关人员纷纷参与其中。

一九三一年四月，日本军部调动多门二郎中将率领的第二师团到中国东北换防（这个师团的士兵多在日本北部寒冷地区出生、生长，适应中国东北的气候）。五月二十九日，板垣征四郎在第二师团干部会上大肆煽动说：日本“解决满蒙问题”的最终目的，是把中国东北“变为日本的领土”，并对

^①石原莞尔，一九二八年任关东军参谋（作战主任）。

^②畑俊六后任日本侵华军司令官，并任陆军大臣。

整个中国“立于制其于死命的地位”。

一九三一年六月中旬，日本军部秘密指派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主持制订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这个“大纲”的主要内容是：

（一）确定了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原则；

（二）“采取军事行动时，需要哪些兵力，与关东军协商后，由参谋本部作战部提出计划，请上级长官批准”；

（三）加强进行宣传，以使日本国民“了解满洲的实际情况”。

后来，日本陆军省密令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到东京接受这份“大纲”，并以指令形式向关东军司令官作了传达。这样，《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便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动纲领。

关东军为了实现“以寡制众”的方案，分散中国东北军的兵力，首先派特务头子土肥原用飞机把在大连的山西军阀阎锡山送回太原，令其出兵华北，牵制东北军，使张学良不能顾及东北；土肥原还唆使军阀石友三参加反对张学良的军事联合行动。另外，又策划在延边、哈尔滨掀起暴乱，“鼓动蒙古独立”，以配合日军对沈阳的进攻。紧接着，关东军将两门口径二十四厘米的重炮秘密运到沈阳，安置在“独立守备队”的兵营内，“一门攻北大营，一门攻奉天飞机场”。为了使进攻时射击准确，关东军士兵伪装成测量铁路的“满铁”职工，测量了张学良部队驻地北大营附近的每个目标的距离。这时，关东军参谋以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为首又进行了第四次“参谋旅行”。在前往“北满”的“旅途”中，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和日本奉天特务机关的花谷正少佐商谈，准备于九月下旬在柳条沟炸毁“满铁”铁路，发动侵占中国东北

的战争。一切准备就绪，关东军便于一九三一年七月至八月间，派板垣征四郎、花谷正少佐前往东京，向日本参谋本部汇报关于发动“满洲事变”的作战计划。

日本帝国主义一经确定发动“满洲事变”的计划，便在吉林省长春县万宝山山村挑拨中、朝两民族农民之间的关系，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并大肆进行所谓中国不仅“排日”，而且迫害朝鲜人的宣传，在中、朝两个民族之间，在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煽动仇恨情绪；不久，日本政府又利用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和井杉延太郎到中国东北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特务间谍活动时，被驻达苏鄂公府的中国屯垦军第三团士兵捕获、处死的事情，一面向张学良提出强硬要求，一面在日本国内大肆宣传“日本生命线满蒙的危机”，煽起日本国民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绪，甚至派飞机向日本国民散发传单^①，进行战争煽动，狂叫要借此机会“根本解决满蒙问题”。

一九三一年八月一日，日本国内进行了一次异常的人事调动，许多法西斯军官都被任命担任军事部门的重要职务。曾经担任过张作霖的顾问和驻华武官、熟悉中国东北军内情的侵华老手本庄繁，就在这次人事调动中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这一任命意味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已迫在眉睫。

果然，本庄繁刚一到任，就大肆叫嚣：“满洲形势紧张，必须做好应变的准备。”他煽动部下说：“如有可乘之机，应立即抓住。”同时他分别听取了张学良顾问柴山和大特务头子土肥原的汇报，并审查了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拟制的“作战计划”。从九月七日开始，他到大石桥、海城、鞍山、连山关、公主岭、长春、沈阳、辽阳等地检阅关东军的

^①如金泽第九师团用飞机在他管辖下各地区散发了十万张传单。

所谓“应变准备工作”，特别检阅了攻打沈阳城的实战演习。为了牵制驻沈阳东大营的中国军队和袭击飞机场，他密令驻抚顺的日本守备队做好随时出动的准备。九月十八日上午，本庄繁向关东军发出指示：“一旦有事，各部队宜主动采取积极行动。”

当时，不仅关东军加紧部署，“日本在东北的在乡军人，亦于九月八日奉到密令，分别集中到沈阳、长春、哈尔滨报到”。九月十七日，沈阳日军当局公开在沈阳南站附近的“忠魂碑”前召开所谓“侨民大会”，借题发挥“中村事件”，“煽动日侨仇华情绪，并发给枪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但是，蒋介石不但不进行对日作战的准备，反倒亲自统率大军到江西“围剿”红军，且陆续抽调二十万东北军的大部分主力开进关内，进行军阀混战，致使东北驻防军兵力单薄，而坐镇东北的东北军高级将领，竟有的充满恐日心理，有的为私利置国家安危于不顾，有的甚至愿充汉奸，暗做投降打算。总之，毫无备战意识，如代理东北行政长官张作相就在锦州为其父治丧不归，参谋长荣臻亦在沈阳大操大办为其父祝寿。

这时，李济川^①从张学良、张作相处回到沈阳。荣臻问他：“副司令和辅帅^②有何指示？”李济川回答说：“辅帅指示：对中村事件，日方要求赔偿道歉，我们都可以担负起来。关于讨价还价问题，等辅帅回来再说”。由此可见，中国东北当局不是准备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忠实地遵照蒋介石的指令，一味地向日本帝国主义屈膝求和，以

^①李济川当时是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副官处副处长。

^②副司令指张学良、辅帅指张作相。